

· 历史研究 ·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①

沈伯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关键词:《三国志》《三国演义》罗贯中;天才创造

中图分类号: I207.4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10)04-0001-06

From Chronicle of Three Kingdoms to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SHEN Bojun

(Literature Institut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writing process of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in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rows light on some inaccurate or incorrect views. Luo Guanzhong was a great writer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from Chronicle of Three Kingdoms and Book of the Later Han, absorbed and adapted popular literature into the chronicle framework, appeared in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created heroes and plots with his great artistic talents. When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was finally completed, it was listed into masterpieces in its contemporary counterparts.

Key words: Chronicle of Three Kingdoms;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Luo Guanzhong; great creation

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拥有六个第一:(1)它问世已经六百多年,是公认的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2)它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余人,这在所有古典小说中位居第一;(3)根据它改编的文艺作品门类之广,数量之多,在所有古典小说中肯定第一;(4)与它有关的名胜古迹分布于全国各地,总数多达数百处,其他作品简直无法望其项背,这又是第一;(5)与它有关的传说故事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在古典文学名著中同样是第一;(6)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之广泛与深远,它无疑也是第一。它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亚洲各国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在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中

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怎么形成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题目——《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可能的朋友会认为,这个题目太一般,谈的只不过是些常识。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全面。学术史、文化史的发展经常告诉我们:对于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人们的认识往往有不准确、不全面、与事实不够吻合之处,有时甚至存在严重的谬误。

例如:人们熟知的许多“三国人物”,如果严格按照历史分期,实际上不算真正的三国人物。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始于公元220年10月曹丕代汉,建立曹魏政权,终于280年3月王濬兵临建业,西晋灭

收稿日期:2010-06-04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男,教授,博导,我国著名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

吴,三分归一统。按此标准,董卓(死于192年)、陶谦(死于194年)、吕布(死于198年)、公孙瓒(死于199年3月)、袁术(死于199年6月)、孙策(死于200年)、袁绍(死于202年)、刘表(死于208年)、周瑜(死于210年)、庞统(死于214年)、鲁肃(死于217年)、夏侯渊(死于219年正月)等等,都不算三国人物。甚至关羽也不算,他死于219年冬天,还差一年;曹操也不算,他死于220年正月,还差九个月!大家感到吃惊吧?所以,人们历来讲三国,通常包括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的东汉末期(或曰“前三国时期”),因而也就把上述这些人物都划入了“汉末三国人物”。

又如:号称“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很多人都以为历史上实有其人。1991年,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貂蝉是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貂家谷沟人”;后来,又有人根据民间故事,说貂蝉和吕布都是山西定襄人;再后,四川某县又声称发现了貂蝉的墓碑,似乎貂蝉又成了四川人。实际上,貂蝉形象完全是宋元以来通俗文艺虚构的产物,元代无名氏的杂剧《连环计》(简名《连环计》)和《三国志平话》中都有貂蝉其人,但其形象美感不足,情节组织弊病较多。罗贯中在元杂剧和《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改造加工,把貂蝉塑造为一个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既然貂蝉是虚构人物,通俗文艺叙述其籍贯、经历等自然有较大的随意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貂蝉自述身世,说自己是“忻州木耳村人氏”。对此,学术界从来没有当过真,因为本来就是虚构。因此,上述几种说法不过是沙上建塔,经不起推敲。

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组织摄制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时,一些学者坚持主张剧名应当叫《三国志演义》,主要理由是:《演义》取材于史书《三国志》,是“演”《三国志》之“义”。为此,总导演王扶林先生特地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在给他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三国志演义》的提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剧名仍以《三国演义》为宜。第一,《三国演义》固然取材于史书《三国志》,但同时也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后者在很多地方的影响可能更大。说它就是“演”《三国志》之“义”,并不全面。第二,《三国志演义》与《三国演义》的含义确实不完全相等,但它们都不是罗贯中原作的名称,而是在小说流传的过程中出现的。前者见于明代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相沿已久;后者则见于清代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三百多年来更是深入人心;

它们各自从一定角度反映了《三国》的特点,作为书名都是“合法”的。第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伟大先驱鲁迅先生,在谈到《三国》一书时,有时称之为《三国志演义》(见其所著《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有时又称之为《三国演义》(见其所著《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这两个名称都可以使用,并无高低之分,更无正误之分,要不要那个“志”字,并非关键问题。另一位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杰出先驱胡适先生,其《〈三国志演义〉序》一文,标题称《三国志演义》,而正文的绝大部分则称《三国演义》,进一步证明这两个名称均可使用,不必强分轩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广大读者早已熟悉的《三国演义》这一名称。中央电视台接受了我的观点。

请看,即使是常识,常常也需要进行一番考究,从中获得准确全面的知识。

好,让我们回到正题。

《三国演义》从故事酝酿到最终成书,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到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仅有短短的六十年,加上此前的汉末时期(或曰“前三国时期”,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总共也不足一百年。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上,这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却影响极大。

首先,这是一个由朝政腐败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发展到三国鼎立,再逐步实现重新统一的历史时期。在尖锐激烈、纷纭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涌现出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一大批富有文韬武略的优秀人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他们的功业与作为,斗争与联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十分精彩的篇章。

其次,由于原来的封建专制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自西汉形成的儒学独尊的一统天下已经瓦解,出现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哲学思想最为活跃的局面;道教创立,佛学传播,玄学勃兴,各种理论、各种学派互相争辩,此消彼长,其深度和广度虽然不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几大学说,也没有出现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那样杰出的思想家,但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觉醒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承先后后,继往开来,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期,在政治制度、军事理论、

战略战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仅就文学而言,三曹父子的气势文采、建安七子的慷慨磊落、祢衡蔡琰的悲愤凄切、阮籍嵇康的深沉激越,都深受历代诗人墨客的推崇,并为他们所借鉴。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建安风骨”(或称“建安风力”),倍受推崇,享誉千载,成为后世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光辉旗帜。

再次,这一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中原地区一直由汉族占据统治地位。而这一时期结束之后仅仅十一年,即公元291年,腐朽的西晋统治者内部便发生了“八王之乱”;不久,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导致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相继建立,然后是南北朝的长期对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近三百年;直到隋朝统一南北,才重新恢复汉族在全国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三国时期的历史是汉族单独统治中国的终点和少数民族建立中原统治政权的起点。两汉盛世在此时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在此后开始。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交流与融合,从此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面貌。这一划时代的巨变,对广大民众心理的震撼极为深刻而久远。

因此,从东晋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三国时期便成为文人学士和广大民众特别关注的一段历史。

最早系统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是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由于马谡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陈寿之父也受到惩罚。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他曾师事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操纵权柄,许多朝臣都去巴结逢迎,陈寿却正直不屈,因而屡遭贬黜。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两年以后,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居家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②、治书侍御史等职。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收集整理魏、蜀、吴三国史料,并参考在他之前写成的一些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陈寿身为晋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以魏国为“正统”,魏国君主均立为《纪》,而蜀汉、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然而,仅从《三国志》的书名就可以看出,陈寿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的,并没有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从总体上看,陈寿在记载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如对多次攻伐曹魏,又惩罚过自己父亲的诸葛亮,他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挟私嫌而用曲笔,而是在《诸葛亮传》中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并且满怀仰慕之情,“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加之取材严谨,文笔简洁,使《三国志》享有“良史”的美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

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没有采用。例如,对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陈寿的记载就不够完整全面,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每一篇的文字都相当简略,对战役的过程、各方的决策和战术的记载显得零乱琐碎,有的记载还彼此矛盾。试看曹、刘、孙三方领袖本传的记载: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公自江陵征备……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南征(刘)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刘)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刘)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周)瑜、(鲁)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

从这三篇纪传来看,不仅记载过于简略,而且存在明显的矛盾。其一,在这场战役中,曹操的主要对手是谁?《武帝纪》说是刘备,几乎不提孙权方面;《先主传》和《吴主传》则说是孙刘联军。其二,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武帝纪》说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完全不提“火烧”二字;《先主传》则说是孙刘联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主传》记载相近,却漏掉“焚其舟船”一语。仅凭这三篇纪传,几乎看不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战役的全貌。相对而言,《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了诸葛亮出使江东,智激孙权,促成孙刘联盟建立的过程;《吴书·鲁肃传》记载了鲁肃建议孙权联合刘备,共拒曹操,反对投降,建议从鄱阳召回周瑜等事;《周瑜传》则记载了周瑜反对降曹,坚定孙权取胜信心,率军直抵赤壁,采纳黄盖之计,火烧曹军等事;它们比之上述三篇纪传,提供了更多的史料。然而,它们的记载仍有不够一致的缺陷。裴松之就批评道:“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孙)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闇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周瑜传》注)“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皆(鲁)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孙)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竟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鲁肃传》注)

因此,如果仅看《三国志》正文,整个赤壁战役的过程就显得不够具体,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

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往往能够以事见人,情趣盎然。例如《三国志·魏书·武

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却没有具体事例;裴松之在注中便引《曹瞒传》中关于曹操“装病诬叔”的记载予以补充,使曹操的“有权数”、“放荡”得到生动形象的表现。《武帝纪》记曹操年轻时,太尉桥玄很赏识他,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是对曹操的正面肯定和极高期望;裴松之注中又引孙盛《异同杂语》的记载:“尝问许子将(即许劭):‘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这又是对曹操的能力和品格的更深刻的评价,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曹操。《三国演义》第一回写曹操出场时,罗贯中把这两条注释都用上了,使曹操的为人从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便弥足珍贵。从此,《三国志》和裴注就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文献依据。

这里顺便说明一点:长期以来,很多人误以为裴注比陈寿原书的字数多得多。甚至权威的中华书局排印本《三国志》(陈乃乾校点)的《出版说明》也说:“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其实,这是宋代以来的无稽之谈,以讹传讹,积非成是。据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统计,陈寿《三国志》共三十六万六千余字,裴松之《三国志注》共三十二万二千余字,陈《志》比裴《注》多出四万余字。

除了《三国志》和裴注之外,有关汉末三国历史的重要史书还有《后汉书》、《华阳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等。

《后汉书》由南朝宋史学家范曄(398—445)在前人已有的史料基础上编撰而成,是记载东汉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有关汉末的史料,此书所载较为全面;一些重要人物,如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刘焉等,此书和《三国志》中均有传,而叙述往往比《三国志》详细一些(但裴松之注中的一些材料,《后汉书》又没有涉及);另外一些人物,如何进、皇甫嵩、孔融、祢衡、左慈等,则仅此书有传。因此,《后汉书》与《三国志》和裴注可以互相印证补充,给后人提供有关汉末人物和事件的更为丰富的史料。

《华阳国志》由东晋史学家常璩(约291—361)编撰,记述晋代梁、益、宁三州^③(今四川省、陕西汉中地区及云南、贵州各一部分)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其中有关蜀汉的史料,往往可以补《三国志》之不足。例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写道:“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记载了刘备初闻曹操之言的惊恐。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补充道：“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则记载了刘备的随机应变。这样，就为《三国演义》写《煮酒论英雄》这一脍炙人口的情节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资料。

《汉晋春秋》由东晋史学家习凿齿（？—384）编撰，编年体，记述东汉光武帝至西晋愍帝281年间的历史，已佚。此书记三国事，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以司马昭平蜀为汉亡而晋始兴，直接以晋承汉，开历史上“蜀汉正统论”之先声。书中许多材料，也可补《三国志》之不足，为裴注所征引。例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诸葛亮南征，仅有一句：“（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南征的具体过程全无，实在太简略。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的记载则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特别是叙述诸葛亮对孟获“七纵七擒”，终于使孟获感动，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成为《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这一情节单元的主要依据。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主持编纂的编年体史书。书中记三国史事，用魏年号，但司马光特地声明：“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故不宜视此为“帝魏寇蜀”。《通鉴》的长处在于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迹，便于了解事件的过程。比如对于上面谈到的赤壁之战，《三国志》的记载显得很零乱，《通鉴》则将分散于不同人物的《纪》、《传》中的有关材料集中，排比取舍，顺次叙述，给人的印象就完整得多了。此书的编年体形式，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和叙事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史传系统之外，文学艺术，特别是通俗文艺，对三国历史也一直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早在魏晋时期，在陈寿的《三国志》问世前后，就已出现了若干关于汉末三国的野史传说。南北朝时期，有关汉末三国的逸闻轶事和民间传说日益增多。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其中就有一些传闻故事，如曹操“借头欺众”、诸葛亮“空城计”、“死诸葛走生仲达”等。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三国逸闻故事，如《搜神记》中的“麋竺路遇火神”、“于吉祈雨”、“管辂教赵颜献酒脯于南、北斗以求延年”，《语林》中的“曹操诈称梦中杀人”、“曹操床头捉刀”，《世说新语》中的“望梅止渴”、“管宁割席”、“曹植七步作诗”、“钟会‘汗不敢出’之对”等等，均为后来

的《三国演义》所取资。特别是《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成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的形象描写的依据。

从隋唐起，三国故事成为通俗文艺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如《大业拾遗记》中的《水饰图经》条，记载隋炀帝曾与群臣在曲水观看“水饰”（浮在水面上的各种木刻造型），其中就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造型，表明隋时三国故事已经广泛流传，并成为艺术表现的内容。唐代许多诗人都有咏怀三国之作，如李白的《赤壁歌送别》杜甫的《蜀相》、《八阵图》刘禹锡的《蜀先主庙》、《西塞山怀古》李贺的《吕将军歌》杜牧的《赤壁》李商隐的《筹笔驿》温庭筠的《过五丈原》等，皆为名篇。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这样两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这时三国故事流传更加广泛，连儿童也相当熟悉。

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各种通俗文艺都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更多的三国题材作品。戏曲方面，当时的“院本”已有“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剧目；影戏中也有三国戏，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一书中的“影戏”条说：“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同时，宋代“说话”艺术十分兴盛，“说三国事”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輒蹙额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得到广大群众、包括儿童的共鸣。北宋末期，说话艺术中已经形成“说《三分》”的专科，出现了霍四究等著名的“说三分”专家，深受观众喜爱。

元代的三国题材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戏曲方面，元杂剧中的三国戏相当丰富，我们今天知道的剧目就有将近六十种之多。元代许多著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高文秀、武汉臣、王仲文、尚仲贤、李寿卿、石君宝、金仁杰、郑光祖等，都创作过三国戏。这些三国戏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以诸葛亮、关羽、张飞、刘备等刘蜀方面人物为主角的剧目占全部三国戏的一半以上；即使是写其他人物的，也普遍表现出“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第二，题材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故事，有的题材虽有历史依据，也

已经过作者的幻化变异,与史实大相径庭。第三,艺术表现力强,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流畅,富有感染力。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如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高文秀的《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郑光祖的《虎牢关三战吕布》数百年以来一直脍炙人口。

小说方面,元代出现了汇集“说三分”成果的长篇讲史话本,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有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在此前后刊刻的《三分事略》。二者内容、风格基本相同,实为同一书在不同时间的两个刻本,因而可以《三国志平话》为代表。《三国志平话》共约8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以刘蜀集团的兴衰为主线,大体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了三国故事。其中许多情节,或直接取自民间传说,或由艺人任意想象虚构;一些史书上有所记载的故事,经过艺人的改造,已与史实相距甚远。全书叙述简略,文字粗糙,不少地方缺乏必要的交代和衔接,可见它原是“说话”艺人讲说三国故事的底本;但它每页均为上图下文(上面三分之一的空间是插图,下面三分之二的空间是文字),看来又是可以供人阅览的读本。从总体上看,《三国志平话》第一次将众多的三国故事串连在一起,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简率的雏形。

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

仍以赤壁之战为例。《三国志》对于历史上的《三国志》的记载显得零乱琐碎;《资治通鉴》综合各种材料,大致勾画出事件的轮廓,但首尾不过三千余字。罗贯中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努力发挥想象的天才,巧妙运用多种形式的艺术虚构,写出了整整八回大书,从诸葛亮出使江东起,到曹操败退江陵止,包括“舌战群儒”、“智激孙权”、“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火烧赤壁”、“曹操三大笑”、“华容放曹”等13个情节。其中,只有“智激孙权”、“火烧赤壁”两个情节大致依据史籍,其他情节是基本上属于虚构(“苦肉计”是对“黄盖诈降”的延伸性想象)。这样,就创造出

一个既反映历史本质而又具有充分艺术真实的、波澜起伏而又妙趣横生的“赤壁之战”。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罗贯中更是既取材历史又超越历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即以书中的头号主角诸葛亮而言。罗贯中继承了长期以来尊崇诸葛亮的社会心理,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①。

三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历史,陈寿《三国志》的记载功不可没。不过,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通读过《三国志》,他们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了解,主要来自小说《三国演义》。尽管这种了解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所区别,但其基本轮廓却是大致可见的,更是生动可感的。因此,我们真诚地感谢杰出的史学家陈寿,也由衷地感谢杰出的小说家罗贯中。因此,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罗贯中是这样一位人物: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只是一个侏得其时的下层文人;而从中国文学史的视角观之,他却是一个雄视千古的伟大作家。尽管我们对他的生平业绩已经难以弄清,但他的煌煌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却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几乎所有名公巨卿、文人雅士,永远辉耀于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1]

注释:

- ① 本文于2010年4月25日讲于“中原国学讲坛”。
- ② 平阳侯相,平阳侯国的相,相当于县令。此处“平阳”系平阳侯的封地,并非陈寿籍贯;“平阳侯”亦非陈寿封爵。部分《三国演义》版本署“平阳陈寿”或“平阳侯陈寿”,误。
- ③ 梁州,三国魏景元四年(263)灭蜀后分益州置;宁州,西晋泰始七年(271)分益州置。因此,梁、益、宁三州大致相当于原来的益州。
- ④ 详见拙文《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并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参考文献:

- [1] 沈伯俊.罗贯中与《三国演义》。自序[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7

[责任编辑 陈玉兰]